

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被捕后,被囚禁于巴伐利亚的兰德斯堡要塞监狱,他在那里写成了《我的奋斗》。此书作为纳粹党的“圣经”,销量一直不错。二战结束后,政府为了阻止内容的扩散,专门设置了一个部门,管理《我的奋斗》的版权。

# 《我的奋斗》即将走出“潘多拉盒子”

二战后,《我的奋斗》被装进“潘多拉盒子”

《我的奋斗》以希特勒个人传记为主要线索,贯穿了纳粹党的主要理论。有人称此书是进入希特勒大脑的密码。作为纳粹党的“圣经”,《我的奋斗》一直卖得不错,特别是从1933年开始,德国每对新婚夫妇都会从结婚登记处得到两本赠书,更使该书家喻户晓。为了保证《我的奋斗》出版发行的正规化,纳粹政权甚至发布命令禁止旧书店收购和出卖此书。到1945年,《我的奋斗》在德国出版发行量达到980万册。在这期间,此书被翻译成16种外文,在世界多国出版。

二次大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德国政府的主要头目判处终身监禁,他们被囚禁在柏林施潘岛特别监狱里,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同时,德国新政权也对纳粹主义思想进行了清算,并将《我的奋斗》永久装入被打上多种封印的“潘多拉盒子”之内。因为希特勒的户籍所在地是慕尼黑,出版《我的奋斗》的纳粹党出版社也在慕尼黑,所以,当时监管德国南部的美国政府就决定让巴伐利亚州管理纳粹党和希特勒的遗产,其中包括《我的奋斗》的版权。在巴伐利亚州政府的经济部专门设置了一个部门,处理国内外对这本书的盗版以及翻译事宜。在必要的情况下,外交部也会出面,将此书的非法出版者告上法庭,以阻止其内容的扩散。因为,德国政府对内不愿意让人们在政治思想上受到该书的煽动,尤其是不愿意让这本书为新纳粹主义抬头造势;对外则不希望外国人看到德国的负面形象。

对于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他们几乎再没有机会读到这部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德国战后重建,德国政府对希特勒及纳粹党的所有书刊都一律禁止。

敢私自印刷德文版,政府告你上法庭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德国学生运动与反战思潮结合在一起,对老一代人在纳粹时期为虎作伥的行为表示不满,要求对纳粹思想和影响进行彻底清算。各种倾向的人就开始通过阅读《我的奋斗》这样的书,各取所需。

上世纪70年代维也纳的讽刺剧作家夸尔廷格尔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了一次巡回演出,在演出中,他朗读了《我的奋斗》中的一些章节。当观众们听到其中荒谬的段落时就会狂叫,而听到那些种族主义和仇视人类的章节时,剧场里突然会变得异常安静。可见此书的影响力之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新纳粹主义抬头,他们找不到希特勒的坟墓,就每年在希特勒副手赫斯生日的时候,去朝拜赫斯在巴伐利亚的坟墓,以此制造声势。后来,当地政府以该坟墓合同到期为由,将赫斯的骨灰挖出来秘密撒到一个池塘里,才平息了这种朝拜活动。

2015年,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宫殿里自杀将过去70年,根据版权法相关规定,《我的奋斗》的版权也将对公众开放。这对新纳粹分子来说,又是一个制造新闻的好时机。而德国政治家也在努



二战时,《我的奋斗》作为纳粹党的“圣经”,销路很好

力,尽可能控制这部书的扩散。也有人利用纳粹宣传物来赚钱。英国出版商麦克吉从1999年开始就觊觎《我的奋斗》德文版。从去年开始,他计划在自己的杂志《报纸见证人》上附带发表纳粹党报《大众观察》上的文章,15页的小册子,印刷了10万册。此事被巴伐利亚州当局告上慕尼黑州法院,要求没收所有印刷品,并处以250万欧元罚金。

学者们出于研究,希望版权获得自由

世人皆知,人们对这部书的惯用语是“20世纪最危险的书籍”。然而,是否这就意味着不要动这本书,让它永远被锁在“潘多拉盒子”里?

2010年,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的邻居——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也开始动脑筋,怎样绕过出版此书的禁令。该所将《我的奋斗》作为专题科研项目,并准备出版这部书的科研版本。这家研究所是德国最大的非大学的历史研究机构,所长是莫勒尔。

正如所有别的版权都有时间限制,巴伐利亚州也不可能永远掌握希特勒及纳粹党的著作版权。根据相关法规,在作者去世70年之后,版权就会自然失效。也就是说,《我的奋斗》自希特勒在1945年自杀之后的第70年,即2015年12月31日之后,其版权将获得自由。换言之,此书在三年后,就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印刷、出版、贩卖。唯一可以用来禁止此书出版的杀手锏,是把它作为反犹太人的政治宣传品来继续加以禁止。

在理论上巴伐利亚州可以向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提出控告。可是,这个研究所却拥有科学研究的自由。

希特勒的传记作家克尔肖也指出,这个自称是领袖的人的书是需要注脚的:“在必要的地方为了让文本更容易理解,应该注明相关信息。而且是非常详细的,科学的注脚,作为理解文本的向导。这将是自史以来第一次,说明这本书是怎样形成的、使用了什么参考资料、希特勒是怎样将他的主意梳理出来的。”

历史学家对《我的奋斗》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希特勒写他自己传记的同时,也叙述了历史事件,比如纳粹党的成立过程。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关于仇视犹太人的段落以及对东欧占领的预言。这些思想观点和计划对科学研究评注的要求都是丰富多样的。

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同意出版该书

一些相关组织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位于纽伦堡的“纳粹帝国党中央大楼”的档案管理中心董事会就要求出版一种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版本。德国犹太人协会秘书长克拉尔也认为,出版一部批评版本,有助于“结束幻想,消除该书的不良影响”。克尔肖对纽伦堡档案管理中心的要求表示赞同,他认为:“今天是互联网的时代,要对读者进行审查已经不现实了。”

前不久,巴伐利亚电视台在网上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参加调查者对是否应该出版《我的奋斗》的问卷做了回答。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好让人们知道历史的真相;52%的人认为可以,不过要加评注。只有近12%的人认为此书不宜出版。

最近,巴伐利亚州相关部门经过多次召开圆桌会议,终于在2012年4月达成协议:州政府出资50万欧元,编辑出版教材版《我的奋斗》,包括英语版、电子版和音像版本,以期对青少年起到正面教育作用。州政府还将与书店、出版社达成协议,让他们只出版教材版本,而不要发行印刷版的版本。

而那些在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灭绝性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及后代,对巴伐利亚州要出版《我的奋斗》教材版感到忧心忡忡,这本为纳粹政权摇旗呐喊的宣传品的自由上市是对他们的一种巨大伤害。反对者认为,希特勒的书已经构成煽动大众罪事实,理所当然应该禁止出版。

禁书在他国成畅销书

其实,《我的奋斗》虽然在德国受到禁止,可在旧书店和互联网上,人们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而世界各国早已有不少地方以不同形式出版了这部禁书。

在前几年,这部书在克罗地亚、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成为畅销书。在瑞士,由于反种族主义法的实施,《我的奋斗》受到禁止。不过,在互联网上,这本书的多种文字版本还是可以下载的。《我的奋斗》的英文版权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出售了。因此,在美国和英国等英语国家,这本书都可以自由出版和发行。

2003年,英文版《我的奋斗》在印度第一次印刷了2000册,销售一空。出版商才知道自己找到了畅销书。从那时起,每年销售1.5万册。人们认为通过这本书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对商业界、自我实现与管理层的策略有所指导。

在土耳其,《我的奋斗》几年来也成为畅销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自2012年3月以来,土耳其的书商和知识分子们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土耳其的年轻人突然对希特勒的书产生兴趣?在安卡拉,多数是大学生去买《我的奋斗》。

在安卡拉的一家书店,在几个星期内至少卖出1000册《我的奋斗》。在土耳其2007年3月的一次调查中,《我的奋斗》在销售榜上甚至位居第3名。虽然土耳其语的《我的奋斗》发行量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不过据业内人士估计,至少已经售出10万册。 芮虎《看历史》

## 中国首支专业缉毒队 队员用鼻子也能分辨毒品



缉毒队工作照片 资料图片

当右手食指落在一张合影上时,云南省文山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潘贵林的神色凝重起来,“这就是陈建军。他是我们缉毒队成立后牺牲的一个人,牺牲时才25岁。”在潘贵林手指的位置,一个年轻人英气逼人,却又稚气未脱。这是一本专门为纪念云南省第一支缉毒队成立30年出版的册子。缉毒队成立于1982年,是我国首支公安专业缉毒队。30年来,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万余起,有40多位民警牺牲,300多位民警负伤。

缉毒队最初对外只称 缉私队

1982年,云南省成立第一支专业缉毒队伍,最初对外称缉私队,直到1988年才叫缉毒队。

1985年夏天,潘贵林得知木央乡堡上村古家晚上有人进行毒品交易。他掌握的情报称,毒贩家中还有一支火药枪和一支全自动步枪。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大概夜里12点左右,我和两名干警摸到寨子里。”潘贵林记得,走到离古家只有10米左右时,同行的一名干警一脚踩到泥塘里,发出响声,惊得整个寨子里的狗全都叫了起来。潘贵林愣了一下,冲上去一脚踢开毒贩家的侧门,并示意其他两名干警晚些从正门进去。他想,这样一来,自己可以吸引毒贩的全部子弹。

由于正门被木头顶得很死,等另外两名干警冲进屋时,潘贵林只身和毒贩搏斗正酣。这一次偷袭,缴获鸦片5000多克、全自动步枪1支、子弹16发、火药枪1支。

“那时候我们出门办案,大多是两人一组。出门前领导交待了,破不了案子不许回来。那时候装备也差,身上只有一支手枪、一个军用挎包,办案多数靠步行。”

穿着花衬衣、喇叭裤和 毒贩接触

从1982年进入缉毒队起,文山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方怀文就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几个月的训练后,方怀文被分到麻栗山。在边境,方怀文的昆明话成了外地口音,这为他打入毒贩内部提供了客观条件。由于是卧底,方怀文大多数时间都穿着花衬衣、喇叭裤在边境上和特勤打交道,和毒贩接触。他随身携带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装着成捆的10元钞票。最外面是真币,中间夹着的是纸片。方怀文把灰涂在侧面,再滴上几滴墨水,看起来像真币一样。方怀文的假身份证一用就是10年。

1986年,方怀文又一次以买家身份和毒贩接触。接触了两个月,双方决定交易。方怀文和以往一样提前几天进了寨子,外围干警守在寨子外面,等着他发出信号。

交易当晚,毒贩突然叫了些什么人到家喝酒。方怀文觉得不大对劲,他低声建议毒贩,让这些人回去,私下交易。毒贩不肯。方怀文妥协说:那就在楼上交货吧,别让这么多人看到。毒贩便提出要再带一个人上楼。

双方看过钱货,确认没问题。正要成交时,方怀文从包里掏出手枪,一把按住毒贩,亮明身份。另一个人眼见不妙,一边大喊一边冲下楼。楼下的人拿起铜炮枪、锄头就要往上冲。

“谁敢上来!”方怀文紧抓着毒贩,大喊着,“叭!叭!”鸣了两枪。“我当时想,这两枪打出去,外围的战友肯定能听到,用不了五分钟就

能赶到。”但他始料不及的是,外围的人根本没听到枪声。此时,弹夹里只剩下两发子弹了。

“打死他!”被擒的毒贩意识到方怀文孤身一人,嚣张起来。“叭!”方怀文把枪口抬高一寸,子弹擦着毒贩的头皮飞到墙上。毒贩一下吓软了。对峙了足有10分钟,接应的战友方才赶来,端下整个窝点。

敏感的嗅觉让他立了 二等功

30年来,当方怀文等缉毒人员不断研究毒贩们的作案手段时,对方也在变换着贩毒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基层缉毒民警刚装备上长江750三轮摩托车时,毒贩们已经开始用吉普车运毒了。而当民警装备79式冲锋枪时,毒贩们已“武装到了牙齿”,甚至配备了AK47、M16A2自动步枪和轻巧的凯夫拉避弹衣,还从国外购置了各种反侦查设备。

运毒方式也千奇百怪,有随身捆绑的,有藏在电脑屏幕和外壳夹层中的,有放在密码箱夹层中的。“还有吃下去的。我们有一次从外面监控毒贩,看到他们把两三百颗冰毒一粒粒放进安全套里。用牛奶泡着,一颗颗吃了下去。”缉毒队的李吉学说,之所以用牛奶浸泡,是为了消除安全套的橡胶味,“最危险的就是这种,一旦安全套破了,人就死了。所以他们一路上不敢喝水、吃饭,我们排查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大多嘴唇发白,张开嘴隐约能闻到橡胶味。”

八年后,李吉学还是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冰毒的情景。“那种味道太香了,说不出是什么香味。有点儿像香精,又不像。”从那之后,他对这种味道异常敏感。“毒品密封不好的时候,一打开小轿车的车门,就能闻到。”

2011年6月20日,李吉学凭借这种敏感,立下了二等功。

当日,李吉学和战友在收费站执行任务。下午,一辆别克在官兵的示意下歪歪斜斜地停在路旁。李吉学站在车外,对副驾驶的一个人进行排查。“我是做生意的,去玉溪收点尾款。”胖子说。李吉学又问了一些问题,对方对答如流。

李吉学突然发现,后座上橘红色的靠垫,艳得有些刺眼。和胖子说话的同时,李吉学装作无意识地摸了一下靠垫,有点儿沉。他悄悄拉开拉链,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

“快跑!”胖子意识到李吉学发现了藏在靠垫里的冰毒,大喊一声。李吉学一个箭步冲进车内。司机、胖子及另一个毒贩相继上车。

很快,赶来的战友同李吉学一起制服了毒贩,缴获冰毒6375克,创下支队查获毒品数量的新纪录。

“你是不是不管我们了?”从开始缉毒到现在,李吉学的妻子多次质问他。“怕什么?我死了,国家会养你们。当兵就是要不怕死。如果考虑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当兵就没意思了。” 王晓《看天下》